

入侵中国的双重作用和列强在华特权享受,以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机制等问题的讨论中,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见解。这些新见解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无疑会是一次新的推动”。汪公则对我说,他自己认为这部专著有一很大遗憾,没怎么讨论近代官僚资本问题。他说:“我老了,而中国近代官僚资本问题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希望你们中青年学者以后能对官僚资本进行深入讨论”。

汪敬虞先生晚年严重失眠,他不再外出开会。但是在湖北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他坚持要参加。他提前两年就找我,希望我也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讨论会,我为此撰写了《试论辛亥革命前中国产业民营化的两条途径——以盛宣怀、张謇的企业活动为案例》论文。汪老师对我的文稿提了很多修改意见。他自己撰写了《中国现代化黎明期西方科技的民间引进》论文,他在文中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恰正预兆着新中国现代化的黎明。它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代表新生产力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就萌生在这个时代之中。他指出,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有官方和民间两个途径。民间的引进活动,不仅时间在官方引进之前,而且他们的努力,更加体现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执着追求的主动精神。这种精神,在今天仍然是值得发扬光大。我们一起参加了武汉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第一天汪公就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代表证,他因此见到餐厅门口的服务员心里就怯怯的,每次就餐都要我带着他,像个老小孩;而在学术讨论时汪公侃侃而谈,又成为我们熟悉的老学者。会议结束我们一起返京,路上汪公有些伤感地说:“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八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有些当年一起开会的老朋友见不到了,下次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会我可能参加不了,争平你要答应我一定要继续进行辛亥革命研究,要争取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会”。

汪公一直希望中国经济史学科能够后继有人,他对中青年学者总是热情鼓励,诚恳教导,严格要求。只要有年轻学者将其文稿送来,无论是本单位的、还是外单位的,甚至是以往素不相识的外地学者的,有时是洋洋百万言的大部头,他都花费大量时间帮别人看稿,提出十分中肯和具体的意见。他为中国经济史学界中青年学者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当我接受吴老建议,准备编写中国近代经济统计研究丛书时,汪公也给我很大鼓励。他说他的家乡明代出了个李时珍,而争平你准备做的工作相当于经济史界的重修本草,很有意义,但要下大功夫。

汪公九十高龄时,对以前他提出的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主张又有新的想法,他认为经济史也可以现代化发展为中心线索,他撰写了以中国现代化发展为中心内容的两篇论文,还有一个现代化研究计划。汪公生命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忆汪老晚年二三事

林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00836)

汪老晚年是在华威西里社科院宿舍度过的。常因一些问题要请教,我家距离又不算太远,见老人家的次数就略多些。

有些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

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

每次去拜访,按了门铃,通常是阿姨来开门。阿姨早已熟悉我了,边引我进屋边叫汪老。总见老

人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东西,或是在摘抄卡片。时汪老已80多岁,见其仍如此兢兢业业,有时不禁劝说保重身体云云。记得一次老人微笑又认真地说,搞了一辈子研究,停下来怎么办?只要还能动,能思考,就多少做一点,实际上每天真正做事的时间是很少了。我很欣赏李商隐的那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的确,老先生的工作、生活、读书、思考,早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每次交谈的内容,都离不开学术研究,或是讨论学科建设或某些具体问题,或是询问《中国近代经济史》第三卷的写作情况,或是研究所、室的动态,等等,给人的感觉是,学术研究以外之事,老人一般似乎都不在状态。

汪老给人的印象是喜怒不形于色的稳重长者,有一次他却有些例外,他告诉我,听说附近开设了一家首都图书馆的分馆,这下可好了,借书可方便多了!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汪老在《中国工商业现代化的开拓者——唐廷枢》一书(可能是最后一本著作)的后记中,再次表明了自己对学术研究与人生关系的看法:“2006年9月,我在《参考消息》转载2006年9月18日英国的《每日邮报》上,看到一则有关百岁老人吉姆·韦伯的报导。韦伯以百岁高龄,每天的生活非常充实。他在一家酒吧间的后花园工作。同其他园丁一样割草、剪树枝、铲土、播种。他有一句正合我心的话:‘没工作的日子真是无聊透了。’我也有一句格言:‘闲着数秒表,比瞎忙还难受。’然而我无能,不能像韦伯那样熟练地割草、剪树枝、铲土、播种。但当我面临我所搜集的资料时,我也会尽量细心地割、剪、铲、播,尽量做到无愧于自己所站在的天地的瞬间。”

二、晚年的学术反思

汪老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在努力完成《中国现代化征程》和《中国工商业现代化的开拓者——唐廷枢》两篇大作。两著均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议题,当非偶然。记得汪老曾对我提起过:他对一生中的学术历程曾予以认真反思,觉得有若干不尽人意之处,其中较重要者(只记得大意不是原话)是:偏重于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揭露和批判,对百余年来中国历史向现代化转化过程中的新事物、新变化的充分重视和深入分析有所不足。他要借“中国现代化征程”这一议题,纠正和弥补以前的不足。首先从资料工作做起。

学术界中都深知,汪老的学术风格和重要贡献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进行的极其深入和透彻的揭露和批判,他善于从细微处发现大问题,以大量的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来说明道理和事物的规律性。即便处于极左的意识形态高压之下,他的著作仍然无处不以事实说话,无处不以道理服人。这正是汪老学术著作在任何思潮中都能永葆生命力和战斗力的原因所在。但就是这样一位学术巨匠,却在年届九秩之际对自己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最严苛的反省,并竭尽最后全力去行动,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晚年的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甚至可以认为这是汪老一生做学问的原则体现。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特点之一:实事求是。

下面以唐廷枢的研究为例,略窥汪老的治学风格(不涉及具体观点和史料)。

唐廷枢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买办,正如汪老所言,关于唐廷植(廷枢之兄)一生和唐廷枢本人前半生所走的道路,在已往的学术论坛上,曾经普遍地被认为是一条应该加以批判的道路。不但这一条道路不能肯定,走上这一条道路上的所有人物,也都不能肯定。

汪老说,“我在初写《唐廷枢研究》这本小册子时,对这个具体人物没有做完全的肯定,也没有做完全的否定。我在等待更多的实证”。这一“等”就近30年。这期间当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在有更迫切工作而不能不暂时中断原来工作计划的情况下,花费大量时间去不间断地搜集和整理唐氏兄弟的资料。对此汪老谦逊地说“三十年来,个人零零星星地也积累了一些资料,从而也积累了一点看法”。这些,都在汪老晚年的专著《中国工商业现代化的开拓者——唐廷枢》及该书的“序”中得以体现。

集数十年之工,为研究唐廷枢兄弟孜孜以求之,为什么?汪老说,“我对他们的研究,也不是单纯地局限于人物的本身。我的着眼点是他们身上反映出来的中国社会。我不是止于微观的研究而是企图通过微观的研究达到宏观研究要达到的目的,并且希望达到宏观研究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可以认为,汪老晚年通过对唐廷枢兄弟的研究,表明了应如何分析中国早期现代中的诸多高度复杂化和多面化的人和事,并以其为可靠的实证资料从中把握全局特征——极度复杂、相互交叉乃至相互交融,正是特征之一。这确实是一般宏观分析或模型所难以企及的,更非公式化地搬用某种“理论”所能解决于万一。

三、对学科建设的关心

汪老晚年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和中國社科院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的发展问题,曾数次与我长谈有关这方面的想法,并经详细思考,形成书面意见,准备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建议未能提交。

汪老认为,经济所的经济史研究室是在原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曾培养出一批像梁方仲、汤象龙这样的优秀专家,出版了《中国棉业之发展》这样的优秀专著。新中国建立后,在经济所内形成了以严中平为首的学术团体,从事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中心的资料整理编纂工作,以严谨的学风和卓越的成果蜚声海内外。“文革”后又增加了古代经济史组并新成立了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和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上世纪80年代中创办了《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并推动了中国经济史学会的成立。最近又开展了中国经济史论坛的尝试。

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几代学者努力奋斗的结果。

但是,经济史研究室和学科建设却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如老一辈学者的陆续退休;新环境下基础理论、尤其是需要长期坐冷板凳的史学、经济史等学科受到冷落;科研骨干严重流失;等等。汪老对此忧心忡忡,并提出了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建议:

一,提高经济史为现实服务的认识,必须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高度出发,着眼于弘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明中的经济和文化优秀传统,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把中国经济史研究摆在它应有的位置上。

二,尽可能改善学科科研人员的待遇,解决人员“进出”的瓶颈问题,加强科研队伍的建设。

三,进一步办好《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中国经济史研究》是经济所对外的一个重要窗口,作为全国性的经济史核心期刊,它具有较大影响力和相当的“权威性”。它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而且远及国外的学术交往。在目前的困境下,办好该杂志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四,关于重大科研项目的争取和开展跨研究室、跨所、跨地区的合作研究问题。

汪老认为,经济所经济史研究室的成绩,凝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其贡献和地位均为世所公认,来之不易。需要继续发展,巩固根基。然而创业艰难,守成不易,何况发展。我们只有不畏艰辛,努力奋进。

四、接人待物

汪老晚年,虽勤奋终日思考和写作,但他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随着岁月的消逝,有时能感到老人对亲人、老友的深深怀念之情。他曾对我满怀深情地说到他的大哥如何帮助、培养他成人的故事。他很伤感地谈起过他接到的越来越多的老友和老同事们的离世消息。他十分挂念仍然在世的老友们的状况。张国辉先生去世后,他对老朋友的挂念之情似更加深,总是想和聂宝璋、杨时旺先生见见面,说,当初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一起工作的,北京就剩下我们三人了。但老人们都年事已高,腿脚不便,尤其汪老。故总未如愿。与此同时,聂宝璋先生对汪老也十分关心,每次我去,他都要问起汪老状况。记得大约是汪老离世前两三年,一次聂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在北海后门有一家餐馆,

北京口味,餐价不贵,约好了汪老、杨先生一起小聚,要我也一定去。聚会很快成行。那是初夏,天气宜人,汪公由阿姨陪同,连我共五人。汪老、聂老已多时不见,话语频频,一时好像饭都顾不上吃了。饭后大家又合影留念。大约几个月后,汪老又约聂公和夫人、杨先生,我和家人去他家小聚,于是在约定之日,大家在汪老家又一次见面。谈兴正浓之际,不觉已到午饭时间,汪老带大家到他家附近一家烤鸭馆进餐。饭后汪、聂两老争着付钱,谁都不肯让步。

这样的聚会,我记得约有三次。现在三位老人中只剩下两位了,回想起大家欢聚一堂时的温馨愉悦,能不伤感乎!

汪老与夫人曹大夫恩爱一生,相敬如宾,为众所周知。曹大夫晚年不幸腿伤,手术后昏迷不醒,成为植物人。汪老将夫人安置在华威西里新居中仅有的两间有好朝向的卧室中的一间,与汪老卧室紧邻。老太太躺在一个可升降的医用气垫床上,雇请阿姨专门照料。汪老则每日必长时间陪伴于侧。记得一次过年后不久,汪老十分欣慰地告我,我们在她身边长时间呼唤,老太太好像还有点反应。相濡以沫之情,天公见之亦会涕泪沾襟。不幸的是,老太太最终还是先走了。

汪老对年轻后学极力帮助扶持,广为人知。我的体会是汪老的这种帮扶体现在极大和极小两方面。所谓极小,举一例说明,他在审阅一位外校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时,除了整体评价外,曾不顾论文之长篇大论,逐字逐句地校正文中的标点符号和错别字。我当时甚不理解,认为80多岁高龄的学术大师怎么也犯不着这么做。经过很长时间,才慢慢体会老先生为了培养年轻人做学问一丝不苟精神的良苦用心。所谓极大,亦举一例:

约1997年,汪老委托我审读《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手工业章的内容并提出意见。我不胜惶恐,虽深知力不胜任,但不能违老先生之意,勉力为之。其中有一节关于手工业行会内容,我看完后写了如下一段话:

我对该问题毫无研究,看完此节后冒昧提出几个门外汉问题。

一,中国、西方封建社会中的手工业行会,在组织形态、社会功能等方面是否完全或基本相同?如有相当差异,比较二者时该如何处理?

二,在近代和近代以前,中国手工业行会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上对手工业的生产、流通起作用?行会对城市手工业和农村手工业的作用似有较大不同,而近代包买商制又大量发生在农村手工业中,它们对原有行会的影响之不同也应有区别,究竟是怎么影响的,甚至两者间有没有对应关系?……

三,手工业行会和商人行会,与近代的商会究竟是何种关系?

四(略)

汪老对我这个晚辈提出的外行问题,不仅未予见怪,反而在页头郑重批示:“以下意见,发人深思,建议进一步研究,生成论文”。

这是在学术的方向性问题上,汪老给予后辈的关键点拨。

说到此,不禁回想起一件令人永难忘记的事。大约在2000年代初,我家住建国门外郎家园光辉南里社科院宿舍。有一天晚上,天已完全黑了,忽接电话,汪老一会儿要到我家来。时间不长,老先生由儿子汪同三所长搀扶着,一步步从一楼爬上了五楼。见到汪老,我真是不知说什么好。其实汪老并无什么事情,只不过要看看我这个晚辈的家而已。

即便对待身边的阿姨,汪老也如一长辈,亲切、和蔼、关心,且高度尊重他人的劳动。春节期间,不仅给足往返路费,而且在她们回家期间给双工资。

最后见到汪老,是和作为特约编辑的纪辛一同去送再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一书,汪老特为此书的再版写了说明。由于这一阶段老人身体明显欠佳,我们不敢多打扰,就很少去。汪老见到我们十分激动,竟至流泪。再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面。当听说汪老病重时,他已住进了监

护病房,不能去探视了。

人生都会有老年,总难免有“人生苦短”之感。但不同之人对老的态度亦多有不同。林语堂说,“生命,这个宝贵的生命太美了,我们恨不得长生不老。但是,生命就像风中的残烛,随时可以熄灭……”,因此,他觉得老年应该是“我们回顾一生,觉得此生无论是成是败,我们都有权休息。悠哉游哉过日子,享一享儿孙绕膝的快乐,在近亲环绕中享受人生的最高福佑”。汪老晚年的想法却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细想一下,倒也可以理解,大概,只有那些将工作、事业、理想和生命融为一体的人,才会有类似汪老的人生态度。当然,这不是多数人可以做到的。有幸的是,在我们经济所研究经济史的长辈中,汪老敬虞、吴老承明,都是这样的大师。我辈“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焉”。

道德文章,巍巍泱泱

——散忆汪敬虞先生

马俊亚

(南京大学历史系 210093)

我在读硕士生期间,跟从段本洛先生学习经济史。汪敬虞先生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及其撰写的论著是我的研究基础和模仿的范本。业师段先生谦和宽厚,对汪先生的学识人品极为赞赏,使我对汪先生抱着朝圣般的心态,一直想报考他的博士生。自1989年春夏一直到毕业,自己始终无法静下心来准备,遂未能在应届毕业生时投考。

1991年夏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某师范大学工作,栖身于一破教室中,仆仆如丧家之犬,所得薪资不足以填饱肚皮,几欲放弃教职南下深圳、海南,以觅一糊口职业。我把自己的苦闷写信禀告汪先生,汪先生立即回信,慰勉有加,教导我不要参与任何不必要的人际纠纷,“困难”环境下往往也是最好的读书时机;并向我推荐张国辉、彭泽益两位经济史泰斗。奈直到1993年元旦我才争取到考博的权利,而那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报名时间在1992年底即已截止,再次失去投考该院经济研究所的机会。

从那时至去世,只要我去信,汪先生必定亲自回复。我是每信必有所求,先生则是有求必应,使我受益无穷。

1993年,尽管我成了一名博士生,段先生对我教诲有加,但由于基础较差,我在学术方面尚是未得途径的门外汉。而自己又一贯有着粗率、急躁、武断、妄言的毛病。1995年,我把博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近代江南地区的资本集中及其经济功能》呈寄汪先生,不但得到了先生莫大的鼓励,而且还热心地推荐给另一位经济史泰斗丁日初先生及其编辑的《近代中国》,遂使我有向丁先生经常求教的机会。1998年,我的博士论文《规模经济与区域发展:近代江南地区企业经营现代化研究》侥幸入选南京大学第一届博士文丛,汪先生又从头至尾地为拙稿进行了修改,提出的意见足足有十来页。

在做博士后研究期间(1996—1998),我把博士后报告的提要《江南地区近代社会形态与阶级结构辨析》呈汪先生指导,先生对许多细节与观点(如关于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江南佃仆的身份问题)均作了推敲。如果说,我的博士后报告尚有些新意的话,与先生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2002年,汪先生又为拙著、也是我的博士后报告《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作了多次斧正,并亲自执笔,撰写了长达8000字的“序”。在这篇字字珠玑的序中,既有一位学术宗师对一名孟浪后进的鼓励,又有一位平生谨严的学者对一部尚未定论的书稿的批评意见。值